

失散易再聚難

劉美玲



從天祿琳琅藏宋本《春秋經傳集解》談起

天祿琳琅《春秋經傳集解》是部現存卷帙完整的宋版書，本院現藏二十五冊，其餘三冊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此書係由三種不同刊本組合而成的一部典籍，組成似乎有意為之，使之成為獨特的補配典籍。宋版書至今已屬鳳毛麟角，類此由三種來源確定的版本補配情況尤屬少見，也造就了全書與眾不同的「典籍」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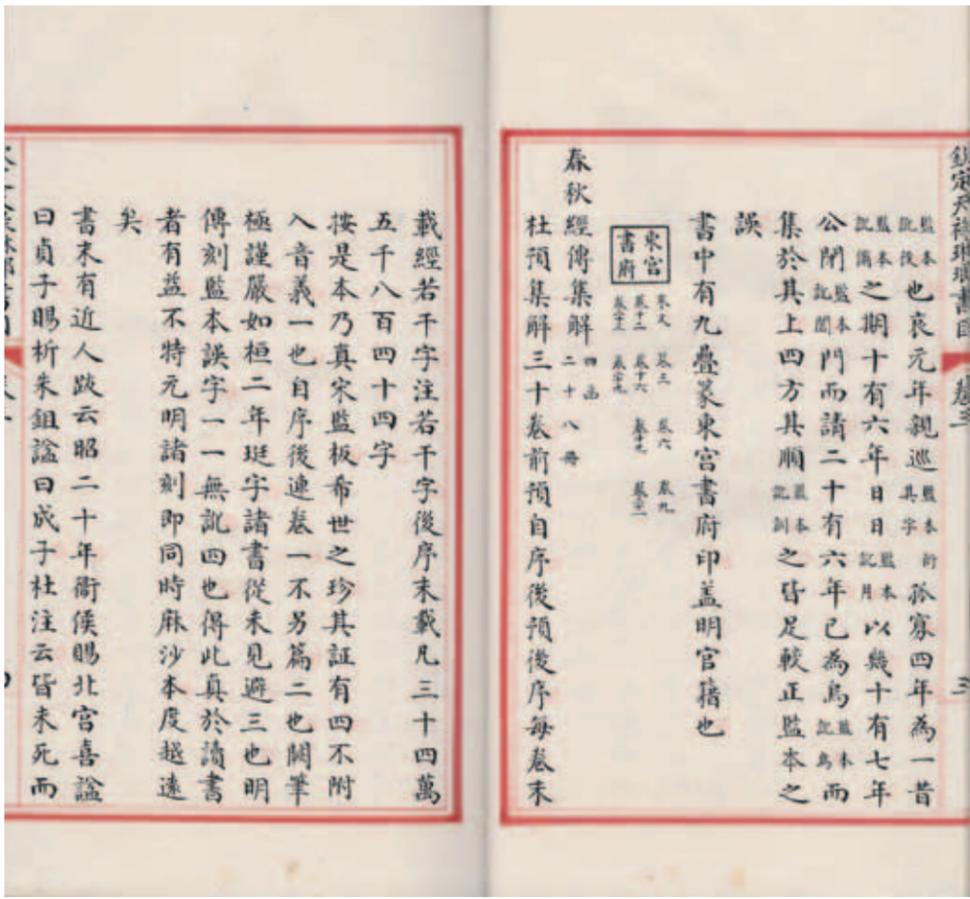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清高宗命內廷翰林檢點宮中舊藏圖書，擇其中宋、元、明珍稀善本進呈御覽，並彙集於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列架陳設，賜名「天祿琳琅」，復命大學士于敏中等編為《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以下簡稱《天祿初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昭仁殿火災，乾隆收藏的天祿琳琅藏書盡燬。仁

宗為了重建「天祿琳琅」典藏，特命內臣從御花園與宮中各殿所藏的舊刻圖書中選出善本，加上自各地陸續收集之善本，再以「天祿琳琅」之名重建內廷善本藏書，又仿效乾隆，命大學士彭元瑞等人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以下簡稱《天祿後編》）。由於初編藏書已遭焚燬，現今所見「天祿琳琅」藏書，又稱「天

祿繼鑑」，悉屬火災後重彙的藏書，其中大多為宋、元善本、影抄宋本及較具代表性的明代刊本，較《天祿初編》所錄更為豐富。清末民初，《天祿後編》藏書或因宮人監守自盜，或因小朝廷盜運，或因偽滿變賣，已開始散佚。民國十四年二月至三月間，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昭仁殿物品時，「天祿琳琅」藏書已殘缺不全。時至

今日，許多當年不知所踪的《天祿後編》圖書已因公私藏書資訊的日漸公開，而被重新發現。北京清華大學劉薈教授（二〇一二）在《天祿琳琅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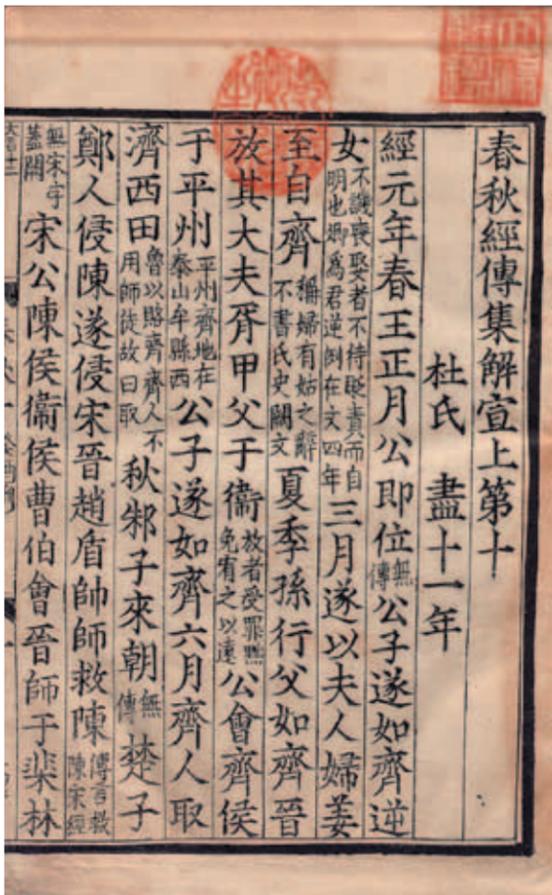
究》一書中指出，現今流傳於世的「天祿繼鑑」善本已「十存其九」。《天祿後編》卷三〈宋版·經部〉著錄的第二部書《春秋經傳集



圖一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三〈宋版·經部〉《春秋經傳集解》之著錄

解》（圖一），是現存卷帙完整的宋版書。全書「四函二十八冊」，經《天祿後編》編輯儒臣定為「宋國子監本」。本院現藏二十五冊，曾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一九七七）。其餘三冊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北京國圖），經該館研究員李致忠先生詳細審定後發現，當初所定「宋國子監本」應為儒臣誤判，實為「南宋撫州公使庫遞修本」，其間原委亦經發表於其所作《宋版書敘錄》（一九九三）一書。藏於本院的二十五冊經典藏同仁詳予考證，著錄為「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圖二）若以整部三十卷而言，當以本院所著錄的版本資料較為完整。本文即由院藏天祿琳琅《春秋經傳集解》出發，探討這部書版本與流散過程。書不只是「書」，它也有「故事」。

《春秋經傳集解》經學地位
傳統經學最初僅以聖人所作之



圖三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撫州公使庫刊本版式：四周雙欄，版心白口，雙魚尾，10行。

「經」為核心，而後則有解說經書的「傳」或「注」，並發展出對「經」及「注」（傳）的詮釋性著作「義」。

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圖書館館長的藏書家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四九）以其所藏的卷一與卷二殘本，參校其經眼的撫州本《禮記》、《公羊》與《禮記釋文》，在《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中推翻了「國子監本」審定。他的說法如下：

此宋刊《春秋經傳集解》，為《天祿琳琅後編》著錄之第二本，存第一、第二卷：以余觀之乃撫州本耳。撫本傳世諸經有《公羊何注》今藏涵芬樓，《禮記鄭注》藏海源閣，余皆獲見原書，其版式行格，

無一不同。余別藏《禮記釋文》殘卷，不獨行款同，其版心標某年重刊亦同，刀法尤酷肖，刊工中相同者有吳中、嚴思敬、高安國、伯言四人，則審為撫州開版，固毫無疑義矣。

「宋撫州本」的審定獲得另一位著名藏書家李盛鐸（一八五八—一九三五）的認同，其題跋云：

此本避諱至慎字止，自是乾道淳熙間所刊，其重刊之葉，標明癸丑者當為紹熙四年（一一九三），壬戌為嘉泰二年（一二〇二），癸酉為嘉定六年（一二一三）。玩其字



圖二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疏」。到了晉代，杜預（二二二—二八四）的《春秋經傳集解》（以下簡稱《杜氏集解》）將經與傳合一，使《左傳》成為闡釋《春秋》事義的作品，脫離了字句訓詁的解說窠臼，而具備了解釋學上的意義。《春秋》與《左傳》在《漢書·藝文志》中是分別著錄的，杜預推崇《左傳》為真正解《春秋》經之作，並博採眾家，解釋《左氏傳》之義，彙聚演繹出以傳釋經的「經傳集解」體例，創造出一種經傳相合的新體，不但使後人易於參照研讀，也使得《杜氏集解》呈現出鮮明的以傳釋經特色。此種以傳附經的改革刊行後，單純的經文本已居末流，取而代之的是經文與注文並行的經注本，經傳分行的體例此後未再出現。《杜氏集解》從目前所見最早的敦煌寫本到清代，甚且民國，都尚有刻印本，日韓亦不乏印本傳世，成為歷代學習《左傳》之最佳門徑。

《天祿後編》著錄《杜氏集解》版本審定

唐代開始以九經取士，奠定了儒家經典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地位。五

代國子監即以石經文與注文同刻《九經》，成為儒家經典刊刻印本之始，亦促成「經注本」之流傳。至宋代，社會經濟繁榮帶動知識需求的增加，雕板刻書盛行，印本書取代寫本書，經書亦成為雕版印刷關注的重點。兩宋時期的國子監即為刊刻經學群書的重鎮，代表了官刻的最高成就，並且影響了州郡縣等地方官府之官學刻書風格。

收錄於《天祿後編》卷三〈宋版·經部〉的《杜氏集解》被清代彭元瑞等儒臣視為「宋國子監本」，緣由如下：

按是本乃真宋監版，稀世之珍，其證有四：不附入音義，一也。自序後連卷一不另篇，二也。闕筆極謹嚴，如桓二年延字，諸書從未見避，三也。明傳刻監本誤字一一無訛，四也。得此真於讀書者有益，不特元明諸刻，即同時麻沙本，度越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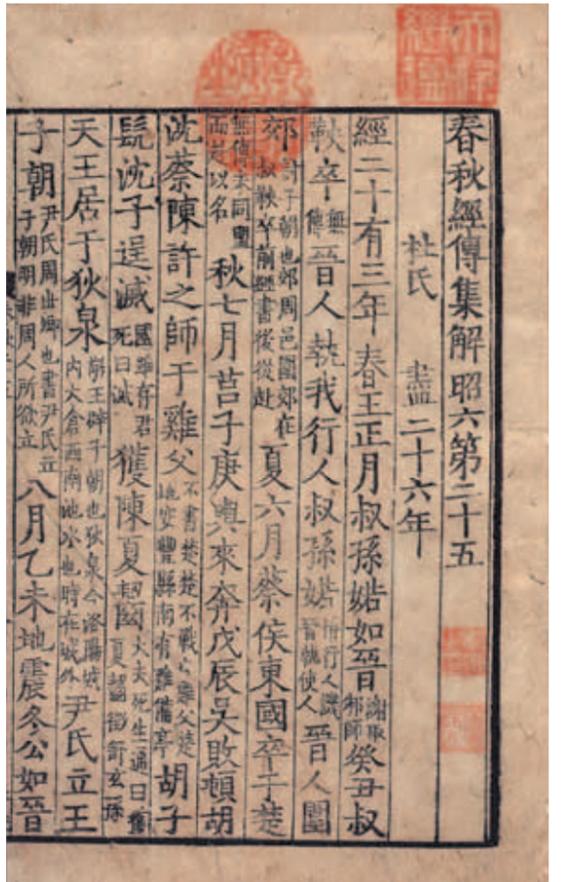
《天祿後編》提出審定為宋「監本」之四個論證，肯定國子監版刻校定嚴謹，錯誤少，內容可信度高，有益讀者。直到民國時期，曾任故

體結構刊雕刀法頗為相合，而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六字，小字二十四，與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禮記》正同，況叔得此審為撫州本，良不誣也。撫州本之傳世《禮記》外，聞有《公羊傳》得是本刊與鼎峙，雖殘珪斷璧，亦當球圖視之。癸酉（一九三三）小寒後八日。

兩位藏書名家的題識，皆以全書的首二卷為依據。不過，若將本院所藏的二十七卷與北京國圖所藏的卷十九詳予檢視，此部《杜氏集解》實由「撫州公使庫刊本」、「江陰郡刻遞修本」及「相臺岳氏荆溪（宜興）家塾刻本」三種不同版本配補而成。茲將因由分述如下：

撫州公使庫刊本

《杜氏集解》卷一至十六，以及卷十八至二十四，共計二十三卷，佔全書近四分之三的版本為宋孝宗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九〇）所刻印的「撫州公使庫刊本」。（圖三）宋代刻書之規模、數量、內容與品質，均超過前世。儒家典籍至宋亦達「經



圖四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江陰郡刊本版式：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10行。

「公使庫」為宋代各地方政府負責招待往來官員的機構，並無專設之刻書經費，乃以「公使錢」的節餘款為之；刻書所得收入更是公使庫另闢財源，補貼公務經費不足的途徑。同時，公使庫刻書也促進了南宋出版

事業的發展，使得「公使庫」成為地方官刻的主要機構。南宋時期的撫州（今江西臨川縣）位居江南西路，為中原人士南遷重地之一。撫州造紙業發達，其「草抄紙」係當時著名的刻書用紙，從而帶動了當地刻書發展。當時的江西與宋代三大出版中心浙江、四川、福建相較，刻書質量非但超過福建，且可媲美浙刻與蜀刻。

據曾任撫州知州的南宋著名哲學家黃震（一一二一—一二八〇）在讀書雜記《黃氏日抄》記載，他在咸淳九年（一二七三）主持撫州九經三傳刊刻的經過如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已未，金人偷渡，興國板已燬於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一二七一），某叻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因用國子監本參對整之。……又舊板為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四庫全書本《黃氏日抄》卷九十一〈修撫州六經跋〉）

黃震將原撫州刻六經三傳，加入《論語》、《孟子》、《孝經》，增為《九經》。此外，元代岳凌在《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亦有宋淳熙至咸淳期間刊刻九經三傳的記載：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漳州舊本、撫州舊本：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復參訂，始命良工入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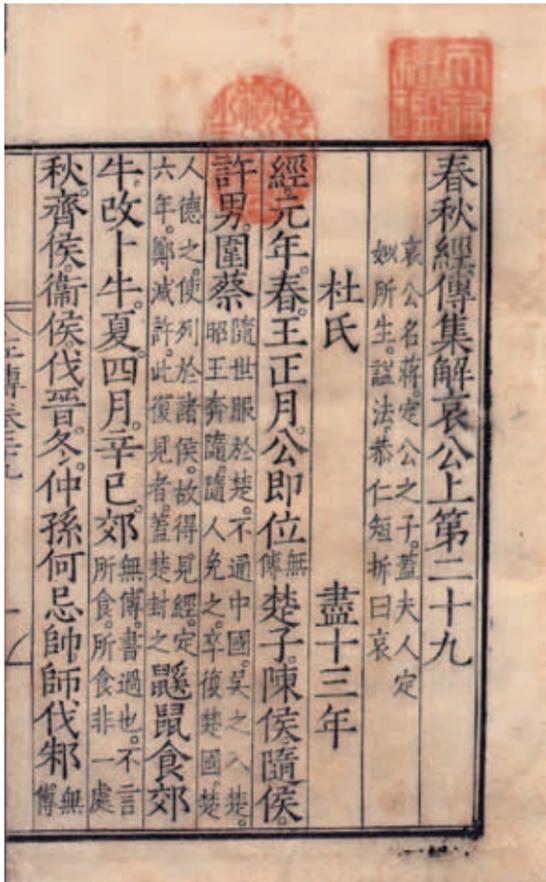
宋黃震所提「撫州板」與元岳凌用以參校的「撫州舊本」，就是撫州公使庫刻印的九經。天祿琳琅所收的《杜氏集解》即其中之一，與其他各經注本同於淳熙至咸淳期間以「國子監本參對整」刊刻。傳世的撫州諸

經除《杜氏集解》外，尚有《禮記》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存八卷殘本）、《周易》與《公羊》三種。諸經的版式與風格皆相似，「行款皆十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四字，白口，四周雙邊，版式疏朗，字大悅目。一般版心上端刻有本葉字數，版心下端有刻工姓名。補刻之葉還在版心標明千支年份。每卷後有本卷的經注字數，書末還鐫有本書總的經注字數。」（註一）撫州公使庫財力較雄厚，所刻之九經三傳，皆核勘精審，字體方正，筆畫流暢、紙墨精良、雕印版面整齊，形式美觀，足稱宋版之

上乘。

本院所藏《杜氏集解》「撫州公使庫版」之二十卷，包括了淳熙至咸淳期間的原刻，癸丑年（光宗紹熙四年，一一九三）與壬戌年（寧宗嘉泰二年，一一二〇）的補刊、重刊，以及癸酉年（寧宗嘉泰六年，一一二一）的重刊版本，其年代與前述民初李盛鐸所題跋著錄的卷一、二中重刊之年代相符。其餘之各補刊和重刊刻工亦與周叔弢（一八九一—一九八四）《宋刻工姓名錄》的著錄相符。（註二）由此可見，分藏台北、北京兩處之書，係出自同一部「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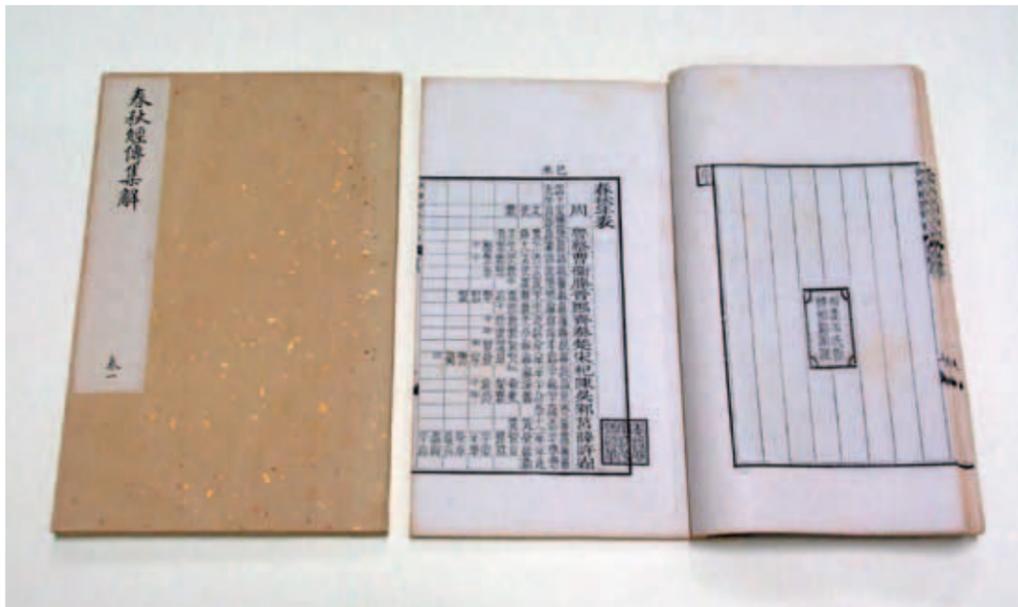


圖五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覆元初相臺岳氏刊本版式：四周雙欄，版心白口，雙魚尾，8行。

江陰郡刻遞修本

公使庫遞修本」。

《杜氏集解》卷十七、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三十等六卷，佔全書近五分之一，為宋孝宗乾道年間（一一六五—一一七四）所刊刻之「江陰郡刻遞修本」。（圖四）南宋孝宗時之刻書多集中於兩浙之路，除了政治重心「臨安」外，其他各州（府、軍）郡、縣地方皆有刻書，且多有傳本於世。日本京都的「陽明文庫」藏有一部全帙《杜氏集解》（卷一與卷二補配日本南北朝刊本），卷末所附淳熙丙午年（十三，一一八六）江陰郡守趙不違的「修刻跋文」載有「紹興初江陰被旨閱借秘閣正本，依其字樣大小，嘗刊是書」文字。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遂將之著錄為「宋紹興刊乾道七年，淳熙十三至宋後期遞修（江陰郡）」。據阿部先生著錄，陽明文庫藏本有「直學葛熙靖監修」、「直學王錫校正重換」，各補修校正者姓名皆與本院藏本所錄相同。阿部先生又審得陽明文



圖七 《春秋經傳集解》 清乾隆48年武英殿影刊元相臺岳氏荆谿家塾本五經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序後之「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牌記兩行

皆附乾隆「御題詩」，序後刻有「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牌記，卷末繫有詳審考證，亦為善本。（圖七）



圖六 《癸辛雜識》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周密對廖氏「世綵堂」校勘、雕刻、紙墨與裝幀極為講許

庫藏本與本院所藏的六卷係出於同一版本，刊刻依據為「北宋監本」，故保有北宋風格，也是《杜氏集解》現



圖八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部分卷冊，本院藏缺卷1至2與卷19，共3卷，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失佚、流傳與回歸
《天祿後編》著錄的《杜氏集解》，是部三十卷全帙善本。民國十四至十六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昭仁殿文物時的點查報告紀錄為「三二〇木書架：八，《春秋經傳集解》二五冊（宋板不全）」；顯見當時已

遺失三冊（圖八），但未記所缺之卷冊次。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整理昭仁殿存書的圖書館界耆老施廷鏞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三）曾撰《天祿琳琅查存書目》一文，按《天祿後編》收錄順序記錄當時存書：其中，「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存二十五

今僅見「南宋江陰郡刻」的刊本。（註三）

明覆刻相臺岳氏荆谿（宜興）家塾刻本

《杜氏集解》卷二十九為明代覆刻本（圖五），其版本可追溯至宋咸淳年間廖瑩中（？—一二七五）「世綵堂」所刻的《九經》之一。據宋代周密《癸辛雜識》一書記載：「廖群玉（瑩中字）諸書：《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草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為籤。」（圖六）周密對廖氏校勘、雕刻、紙墨與裝幀極為讚許，所借「世綵堂」《九經》已不見傳本，今人僅能從元代的翻刻本一窺其面貌。「相臺岳氏」所刊的《九經三傳》曾被視為南宋岳珂所為，及至張政烺（一九一二—二〇〇五）在《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文中考證，實為元初義興岳氏（岳浚）依據「世綵堂」本校正重刻，而與岳珂無涉，因此推翻了《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葉德輝《書林清話》等前人

的考證與說法，成為現今對「相臺岳氏」《九經三傳》版本的新認定。（註四）岳浚在其所撰《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稱「世綵堂」本係「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漳州舊本、撫州舊本：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說明了全書出於精良的私家刻書，並廣集當時所傳的版本，由各經學專家名士校勘參訂後，再經整理、編排、付梓，使其內容、形式都有了新的變化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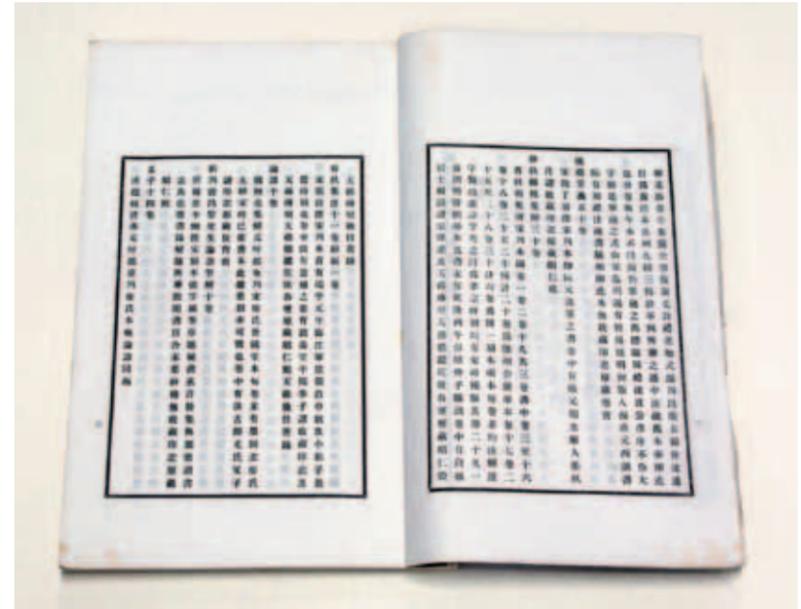
另據清代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記載：「宋岳倦翁（實為元岳浚）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併與國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皆羅列條目，可見其詳審矣。」（《書目類編》）由此可知，岳氏刻書極為謹慎與不苟。後來，清代武英殿及各省書局均有翻刻本，稱為《相臺五經》，各部經卷首



圖十一 《雙鑑樓善本書目》 民國18至19年江安傅氏北平藏園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書



圖十 《天祿琳琅現存書目》 《故宮善本書目》，北平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民國23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書



圖九 《故宮善本書影初編》，北平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民國1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書

冊」，亦僅簡單地註明存書冊數，並未述明所存或缺之卷次與審訂版本。
(註五)
民國十八年，任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張允亮先生（一八八九—一九五二）主持編纂《故宮善本書影初編》，不但明確著錄了天祿琳琅藏本中《杜氏集解》之存書現狀，亦詳加記錄了存卷的版本、題識與印記：

(圖九)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晉杜預集解，宋刊本，缺卷一、卷二、卷十九，共三卷。書中卷三至十六、卷十八、卷二十至二十四，計二十五卷為撫州公使庫本。卷十七、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三十，計六卷為別一刻本，兩本每卷末均注經注字數。以避諱字考之，同為孝宗時刻，均有宋時補版。其第二十九卷一卷則明覆相臺本也。書末有乾隆丙午（五一年，一七八六）彭城仲子題識，卷中有白拙居士、楊灝諸家印記，及天祿琳琅、天祿繼鑑、乾隆各重，原藏昭仁殿，天祿琳琅後目著錄。（北平市：故宮博物院，民國十八年）

之後，張允亮又於編輯《天祿琳琅現存書目》（一九三四）時增加版式行款的著錄，其中亦有關於《杜氏集解》存書狀況的著錄說明：（圖十）
春秋經傳集解 四函二十八冊 晉杜預撰三十卷，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刻本，半葉十行，經傳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四字，配乾道間江

陰軍學刻本六卷，半葉十行，經傳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又明嘉靖復宋相臺岳氏本一卷，闕前二卷，存二十六冊。」（收錄於《故宮善本書目》，北平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九三四）
張氏在缺卷上僅記「闕前二卷」，似乎與他民國十八年所見存佚卷數不同，這也是目前所見指稱《杜氏集解》存有二十六冊的唯一紀錄。
民國十六迄十七年擔任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兼圖書館館長的傅增湘先生（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在其《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對於個人所收之撫州本《杜氏集解》卷一卷二的著錄附有尾語：「清宮佚書，癸亥（一九二三）歲得之東華門外冷肆，價一百五十金。丁卯（一九二七）歲清點故宮藏書，則全帙固在，為缺此冊及第九卷。」（註六）尾語中所稱「此冊」即其自藏之卷一至二，第九卷應為第十九卷之筆誤。張允亮《天祿琳琅現存書目》所著錄的《天祿後編》存書，今皆藏於本院，《杜氏集解》確為二十五冊。本院典藏的二十五冊，曾隨故宮文物南遷避寇。

至於全書之第一與第二卷何時流出宮外，已不可考。

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時，撫州本的《杜氏集解》卷一卷二已不存於宮內。民國十二年，傅增湘在北平東華門外的書攤購得，並經收入其藏書目錄《雙鑑樓善本書目》（圖十一）：「《春秋經傳集解》二卷，宋刊本，十行十六字，內府藏書，存第一、二卷，有乾隆六重、白拙居士印」（卷一·經部）。傅氏《藏園群書題記》（民國三十二年）更說明了藏書來源：「原書今尚存昭仁殿中，余領故宮圖書館時曾躬檢得之，此首二卷不知何時流出，余昔年得之東華門外橋畔冷攤者也。」此外，他又親撰《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藏園群書題記》卷一），推翻了《天祿後編》宋監本的審定，將之重新定位為「宋撫州本」。

民初，北平著名書肆主人王文進（一八九三—一九六六）曾經眼此二卷，並於其《文祿堂訪書記》（一九四二）之《春秋經傳集解》條著錄：

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存卷一卷二，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三、四字，白口，板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宋補刻板心有壬戌勒三字刊名王彥：癸丑重刊四字刊名：癸酉刊三字刊名：序接經文，卷末刊經注若干字二行，宋諱避至慎字。：有天祿琳琅、乾隆御覽之寶、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白拙居士、淵之、李盛鐸各印。

近代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曾收藏一部元代「岳氏荆溪家塾刻本」的《杜氏集解》，現存北京國圖。周氏於民國十九從北平琉璃廠書肆「藻玉堂」收得六卷（卷十二至十三，卷二十七），繼於二十年自「肆文堂」收得二十三卷（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二十六），共計二十九卷。他雖殷勤蒐集，仍缺首卷，不得已遂於二十二年間以「宋撫州本」補齊：「三月三日，缺藏的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經傳集解》首冊，近聞已毀於上海閘北之難，不存於世，因從傅增湘請得宋撫州本首冊補足，並記之。」（註七）三十三年，友人曾告



圖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16（撫州本）與卷17（江陰本）兩卷版本不同，合為一冊，僅卷17（江陰本）鈐有印記。

知「元岳刻本」的《杜氏集解》卷一為嘉定徐氏所藏並求售中。周氏託人多次議價，皆因「索價奇昂」難以購得。三十四年，他曾函請趙萬里（一九〇五—一九八〇）先生代為促成購書之事，並提及「岳刻如復完，撫州本卷一、卷二當仍歸之故宮也。」至三十五年歲末，周氏以黃金一兩購得卷一，蒐羅長達十六年的「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杜氏集

結語

本院所藏二十七卷《春秋經傳集解》經完善的典藏與維護，曾於本院多次展出，並已完成數位化。此部天祿琳琅藏書係由三種不同刊本組合而成；其中，「撫州公使庫」刊印者佔大宗，次為「乾道江陰郡刻本」，再次為「明覆刻宋本」。嘉慶年間，宮中儒臣以極短時間廣蒐「天祿繼鑑」藏書，審定編輯書目的壓力一定很大。本書並無一般書賈掩蓋仿刻事實與惡劣的造假手法，誤判為宋監本，未對補配刻本加以說明，恐是宮中飽學儒臣未細加翻閱全書所造成。

又此部《春秋經傳集解》除了天祿皇室諸印外，撫州本、江陰本與明覆相臺岳氏本並無重疊之印記，或可推論各會由不同的藏書家典藏。其中，撫州公使庫刊本鈐有「潘耒私印」（經周叔弢先生審定實為「淵之私印」）、「白拙居士」印記，乾道江陰郡刻本則鈐有「楊灝之印」、「繼梁」印記；反之，明覆相臺岳氏本則無任何印記。由此可見，三個刊本的組成似乎是有意為之，使之成為獨特的補配典籍。另卷十六（撫州

解》終得完帙。

周叔弢先生隨即於民國三十六年致函趙萬里，重申捐撫州本《杜氏集解》卷一、卷二心意之堅：「前談宋本《群經音辨》首、末二冊近在故宮發現，宋撫州本《左傳》自卷三以下，亦在南邊書中。運舊藏《音辨》中冊，《左傳》卷一、卷二兩冊，正可補成完書。此二書皆宋本上駒，然為劍合珠還計，不應再自秘惜。今特檢出奉上，乞代獻之故宮博物院，書之幸，亦運之幸也，此等事非尋常交易，豈可言錢？更不能計多寡。區區下忱，乞代達馬先生（馬衡）為叩！」他又於岳氏刻本《杜氏集解》題識中提及撫州本卷一、卷二歸之故宮的原委：「丁亥（民國三十六年）春，余既獲岳刻首冊作延津之合，遂檢前得宋撫本《左傳》二卷，宋汀州本《群經音辨》二卷，歸之故宮。此二書紙墨精美，宋刻上乘。：故宮所佚，得此極為完書，余豈忍私自珍秘，與書為仇耶！去書之日，心意惘然，因記其端委於此。」（註八）

事後，故宮博物院支付了五百萬元的書價。周氏隨即致函申謝：「本」與卷十七（江陰本）兩卷版本不同，合為一冊，僅卷十七鈐有印記，似為有意補配之又一明證。（圖十二）

宋撫州公使庫本《春秋經傳集解》並無全本傳世，僅存分藏兩岸的「天祿繼鑑」藏本二十三卷，猶缺卷十七與卷二十五至三十。乾道江陰郡刻本部分，雖日本京都陽明文庫藏有全帙，然卷一為日本南北朝時所補

「宋本三冊（指《音辨》中冊，《左傳》卷一、卷二兩冊）承故宮惠賜書價五百萬元，頃已收到。優渥之情，曷勝感謝！此固非尋常交易可比也。馬（馬衡）、袁（袁同禮）二先生處乞代達為叩。」周氏在《自莊嚴堪書目》與《宋刻工姓名錄》中皆曾言及撫州公使庫本《杜氏集解》售予故宮之事，但此二書並非先言價再售書，可見他以書之完整為要，並不以書價為意。（註九）

北京國圖藏「宋撫州本」《杜氏集解》為卷一至二，以及卷十九，共三卷。其中，卷一至二即周叔弢所藏（註十），一九四七年售予故宮博物院，卷十九則不知何時自宮內流出。一九五八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天祿琳琅藏書調撥至北京圖書館（今北京國圖），一九五九年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將撫州本《杜氏集解》著錄為存三卷，包括一至二、十九。筆者經詢問北京國圖，知此三卷均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登帳的時間是一九六〇年一月三日；至於卷十九流出後何時重歸故宮博物院，尚無明確答案。

抄。所以，除明覆相臺岳氏本外，其他兩刊本既是傳世孤本，亦是殘本，並不屬於單一刊本。中國古籍一部的書的冊數常多達二、三十，保有全帙已非易事，全帙為同一版本的難度更大。宋版書至今已屬鳳毛麟角，類此由三種來源確定的版本補配情況尤屬少見，也造就了全書與眾不同的「典籍」特質。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張麗娟，《宋代經書者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頁六七。
2. 本院所藏之撫州公使庫本《春秋經傳集解》刻工著錄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與《宋刻工姓名錄》相對相同者如次：高安國、黃珍、占奐、祝士正、吳仲、思敬、伯言、余章、劉明、余定、黎明、鄭才、余安、鄧成、阮升、劉永、高安道、志海、俞先。《宋刻工姓名錄》收入於《周叔弢古書經眼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下冊，頁五一—五二。
3. 阿部隆一著，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集，《阿部隆一遺稿集》，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五，第一卷，宋元版篇，頁三二。
4. 一九九一首先發表於《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後收錄於《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四，頁一六八—一八八。
5. 點查報告紀錄見清查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第一編，第三冊，頁一一。
6. 《天祿琳琅存書目》，《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六年九月。
7. 《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市：中華書局，一九八三，第一冊目錄·經部，頁六五。
8. 撫州本卷一、卷二歸之故宮的原委，參見李國慶編著，《致翁藏書年譜》，合肥：黃山書社，二〇〇〇，頁七十一，一六三、一六九—一七〇。
9. 此則題識書影見《書香人淡自莊嚴：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古籍展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三，頁一一。
10. 《自莊嚴堪書目》與《宋刻工姓名錄》二書收入於《周叔弢古書經眼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九。
11. 書影見周一良主編，《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第七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一五八—一五九。